

臺灣外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 「跨」視域與方法

張淑麗*

在 2015 年我受邀撰寫當前文學二學門「熱門與前瞻議題」的報告時，我在所負責的「美國文學」的研究趨勢中，提出「當前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已經走入『後經典』的時代」的觀察，並指出「美國文學研究的格局與範疇逐步在擴大，呼應了莫瑞迪 (Franco Moretti)、麥格爾 (Mark McGurl)、韓瑞 (Eric Hayot) 等學者的觀察，顯示出美國文學研究的研究範疇已然跳出理所當然的預設立場」。也就是說，在爬梳美國文學研究的趨勢之際，我們也會發現「時至二十一世紀初，何謂『美國』，如何『文學』的課題，又再次搬上檯面」。具體而言，我觀察到當前美國文學研究正在朝向跨文化、跨學門、跨國族、跨性別、跨媒體的「跨」的方向發展。

美國研究學會的會長費雪金 (Shelley Fisher Fishkin) 於該學會 2007 的年度會議上發表會長年度致詞〈美國研究的跨國轉向〉(“The Transnational Turn of American Studies”)，公開宣稱美國研究學者已經進行了一場寧靜革命，集體轉向以「跨國」為研究方法與課題，她並以篇幅超過三十頁的長文引經據典來證明，跨國研究成為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主流；也就是說，根據費雪金的觀察，美國研究已經於二十世紀初就跳出國族主義的自我想像，而轉向探討國族想像的邊界、界面與對立面。

費雪金呼籲美國研究學者必須跳出單一國族的觀點，而由跨國多元流動的觀點來重新理解與進行美國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她的觀點也得到美國研究重量級學者皮斯 (Donald Pease) 的背書，後者指出，所謂的跨國觀點，意味著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在方法學上，體認到現代化所引發的暴力、戰爭與災難都已然導致文化與國族的跨域與混雜。因此，由單一國族觀點來理解與回應美國文學與文化的發展，必然導致觀點的僵化，而必須採用跨國多元流動的觀點，才能

*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科技部人文司文學二學門召集人

重繪美國研究的學門想像、思想圖像，以及與對世界的認知。宋惠慈 (Wai-Chee Dimock) 則從「跨文化」的向度，重新閱讀美國作家，爬梳美國作家如何感知與回應美國之外的「世界」的語言混雜與文化交涉，勾勒出跨越時空、透過文本對話而形塑出的全球感知共同體。同樣地，基於這種以「跨」為批判策略的前提，比較文學學者沙地瓦 (José Saldívar) 也提出了「汎美洲性」(Trans-Americanity) 的概念，藉此以探討在旅遊與移動路徑中所開啟的各種平行、相左、僭越、岔出的可能關係與聯繫。

時至 2022 年，我發現這樣的現象也不限於美國文學的研究上面，而明顯展現在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的「跨」。這種研究上的轉向，也反映在臺灣外文學界的整體研究趨勢上，可由科技部人文司文學二（也就是外文學門）的專題計畫申請件數上微露端倪。109 年度專題計畫申請案中，共計有 46 件申請案是由申請人自行歸類於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的範疇。110 年度這兩個領域的申請件數略微提升為 49 件。在 109 年度中，申請人自行歸類為文化研究跨領域範疇的申請案為 34 件，若再加上廣義上亦屬於跨領域研究的族裔研究與性別研究的申請案，則跨領域走向的文化研究領域總申請案亦有 46 件；而 110 年度文化研究、族裔與性別研究的申請案總計亦有 48 件。綜觀 109 與 110 年度的專題計畫申請案之件數，傳統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研究的總件數與文化研究、族裔、性別研究的申請案總件數不相上下，可見由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經典與傳統的「內部」角度來從事文學研究的趨勢雖然仍然是主流與大宗，但是從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外部」來從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趨勢卻也日益增長。

問題是，既然在我們身處的時代，跨文化與跨國族的交涉已經成為必然，如何在古／今、中／西已然錯縱複雜的跨域交鋒中，不但重新描述與詮釋外文文本，又得以彰顯出當代與在地的關懷，甚至提出跨文化閱讀的方法論，成為在臺灣的外文學者在研讀經典之餘，所不斷反思的議題。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或可再回來思考「跨」作為方法學的潛勢。在 2015 年的「熱門與前瞻議題」結案報告中，我除了指出「美國文學研究整體研究趨勢持續朝向『跨』(trans-) 的方向轉向」之外，並進一步釐清，「所謂的『跨』，包含了交易 (transact)、運輸 (transport)、貫穿 (traverse)、過渡 (transitional)、翻轉 (translate) 和逾越 (transgress) 等多元的含意與面向」。也就是說，所謂的「跨」指涉的並非實質性的運動，而是批評方法上、詮釋策略、分析對象的移轉與詮釋角度的調整。「跨」的論述更反映出美國文學研究者重劃學門邊界，積極開啟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門之間對話的積極企圖。「跨」直指研究方法的重新思考，呼

應跨國族與跨文化經驗儼然已經成為日常經驗與美學考察的前提。當「跨」的研究取徑不再以同一性的語彙來定標，多重身分的形塑、展演與再現也迫使美國文學研究者挑戰各種普同主義的幽靈，而在流動的空間與時間情境下，考察物質經濟、意識形態、詮釋方法、互為主體的跨地域與時空的錯置與再現。

這樣的觀察其實也適用在今日臺灣在地外國文學研究的整體研究趨勢發展上的流變與轉向。在臺灣從事外國文學的研究不可能不從古／今、中／西之間の間距出發，但是觀察到文化的差異，並不代表當代的外文學者就必然從差異走回認同，而重新提出早年比較文學所擁抱的普同人文價值、先驗性的文學性等詮釋概念，或者僅僅以中西文化影響、翻譯、接受、改寫為研究的方向。相反地，對臺灣的許多外文學者而言，「跨」不僅形構了研究的視野，促使研究取徑的多角化，也發展出跨文化的方法論。

王智明在他甫於 2021 年 11 月由聯經所出版的鉅作《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中，非常精準地以「落地」、「轉譯」為關鍵詞彙與概念，來捕捉我所觀察到的英美文學的跨文化研究轉向。他更犀利地指出英美文學的研究趨勢的轉向與轉譯，不但植根於、也反映出在地文化知識生產的需要。在臺灣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總難免有一種遲來晚到的局外人的心態，固然局外人亦有可能由他者的角度來解讀外國文學中的去熟悉性，反而因異文化視角的差異，而開啟新的詮釋可能，但是局外人最終難免要反思外國文學研究對於在地的文化、美學、生命意義的新解。這種局外人必然的反思賦予了臺灣的外文研究雜沓而後設的取向與跨文化視域。因此，「落地轉譯」並非比較文學的文化影響與編譯，而是體認到現代性的創傷，由這現代化的斷裂作為基礎，以「系譜學」的視野來面對歷史，將外國文本放置在當代跨文化的美學視域內，選擇性挪用有利於專注與轉譯當下與在地的思想資源，而進行創造性的互文對話。

一方面，這股跨文化研究反映在王智明所觀察到的在地關懷。因此，外國文學的研究者不但轉向研究在地文學與文化，也促使在地外文學者由「文學理論」、「文化研究」、「族裔研究」三個角度來切入，將臺灣在地學者的跨域視角編入「落地轉譯」的拓撲圖像中。在二十世紀八十與九十年代，英美外文學界也曾因為文學理論之強勢崛起，而造成了學門的版圖重繪與重組，而隨著文學理論之主體建構論為學界廣泛接受，文化研究與族裔研究成為文學理論主要操練理論的場域，藉由強調認同為論述建構之產物與文化為弱勢發聲之場域，而達到以文學與文化介入社會，改造思維之基進目的。在臺灣的外文研究發展也因應文學理論的論述與思維衝擊，而從在地的角度思考在臺灣從事外文研究的意義

與目的。影響所及，外文學者或思索以「臺灣」為研究方法的可能，或者由理論出發，借道在地文化的分析，來凸顯理論在旅行過程中所出現的跨文化盲點，也藉此打破東方文化／西方理論的二分。後殖民研究亦從跨現代性的觀點重新檢視現代性的進程，跳出另類現代性、多元現代性、遲來的現代性等思考框架，而或者由與西方（the west）相對的他方（the rest）的角度切入思考現代性的不共普同的時空向度與研究取徑；或者也從「全球化」的角度來扣問以「亞際」研究與「大洋洲」研究為方法學的可能性。整體而言，臺灣的外文研究儼然已由多語言與多文化的向度，凸顯出多角度「脈絡化」的角度出發，跳出英美文學的疆域，帶來新的研究動能，豐富了臺灣外文研究的風景。

另一方面，雖然由 2020 與 2021 這兩年專題計畫的申請件數來看，在臺灣的外國文學研究確實轉向至文學理論、文化研究、性別研究與族裔研究，但在看似仍歸類於傳統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研究範疇的研究中，亦可見跨學門方法學的崛起，而嘗試採用源自於社會學門、哲學學門、文化地理、歷史等學門的研究方法，來發掘外國文學之當代新義。也就是說，如果臺灣有一批外文學門的學者關心的是外國文學與文化的「在地轉譯」，則臺灣也有一批外文學者嘗試將外國文學放在「世界」的脈絡下，而透過跨領域的文學研究方法提問外國文學如何在不同時代形塑不同的族群、階級與世界想像。這些外文研究不再篤定地認定外國文學研究的理所當然，而從方法學上來闡釋外國文學對於在地或全球的「相關性」(relevance)。研究者的出發點已經不再是這些外文文本的經典價值，而在於這些文本能夠啟動什麼新的思維、開啟什麼新的問題意識。

因此，在中古時期研究出現了「全球中古」的課題，透過分析中世紀的全球經驗與想像，而凸顯出中世紀的歐洲並非全世界，而只是眾多文化匯流的網絡之一。情動研究對於人與物的彼此觸動的強調，也帶給浪漫文學新的分析概念，凸顯出情感的認知層面及其和身體感覺的連動。維多利亞時期文學研究也因為採取物質文化的觀點切入，而從物件的發明、流行、使用，來重新定義維多利亞時期對於流動與流通的想像。研究者亦從醫學史的角度切入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學中展現出的疾病論述與醫療想像，或從科技史的角度審視現代化所導致的種族、階級、性別的跨界混雜，而分析這些文本如何凸顯、展現、詮釋現代化的認識論上的危機。另外，外國文學研究不僅邁出國族主義的框架，提出何謂「外國」，反思如何「文學」的大哉問，更進一步扣問人文研究的核心分析概念，以直搗黃龍之姿，質疑人類之何以為人，何謂「人文」，如何「美學」。這股「後人文」的思維方興未艾，促成外國文學研究的倫理轉向、生態物質主義的崛起、醫療與人文的跨學門對話、從文學中發掘人與動物的動態關係等等。這些

新興領域的崛起，顯示外國文學研究企圖跳脫以人為中心之知識體系與思維邏輯，甚至開啟人與物以及與外在世界的新的關係。

在臺灣的外文研究或採取跨文化的視域，從在地的角度出發，選擇性挪用外文研究的思想資源，來扣問外文研究如何回應在地文化的探討，藉此啟動當下與未來的轉譯潛能；或專注在外文文本的研究，採取跨領域的視野，跨越學門的界線，選擇性地由人類學、人文地理、社會經濟、歷史系譜、科技醫學的角度切入，讓外文文本得以與多元的批判理論進行創造性的互文對話。在方法論上，外文研究由「跨」的角度來重思國家文學，以超越國家文學的「英語語系文學」(Anglophone Literature)、「法語語系文學」(Francophone Literature)、「西語語系文學」(Hispanophone Literature)等說法來探索語言與文學如何跨越內部與外部的界線而想像充滿異質的想像共同體。整體而言，「跨」的面相，不但展現在西方社會的外緣，涉及中／西的文化交涉，也使得「跨文化」的流動與轉換，成為外文研究的主要探討課題與挑戰。

參考文獻

- 王智明 (2021)。《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蔡振興、張淑麗、黃翠娥、李秀娟、楊明蒼、陳音頤、李紀舍、陳春燕 (2015)。〈2015 年文學二學門熱門與前瞻議題專題計畫期末結案報告〉，臺北：科技部。
- Dimock, W. C. (2007). Introduction: Planet and America, Set and Subset. In W. C. Dimock & L. Buell (Eds.), *Shades of the Planet: Americ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pp. 1-1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v39x8t1.3>
- Fishkin, Shelley Fisher. (2005). Crossroads of Cultures: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 57(1): 17-57.
- Pease, Donald. (2011). Introduction: Re-Mapping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Winfried Fluck, John Carlos Rowe, Donald Pease (Eds.), *Re-Framing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 Dartmouth University Press.
- Saldívar, José. (2012). *Trans-Americanity: Subaltern Modernities, Global Coloniality, and the Cultures of Greater Mexic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